

资源约束下农村集体经济治贫效应及经验研究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的贵州 A 村案例分析

张舒甜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贵阳 550025)

摘要: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是稳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工程。本文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框架,构建了资源约束情境之下脱贫地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并利用该框架对贵州 A 村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前后的贫困治理过程进行了动态探索诊断,分析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治贫效应。研究发现:(1)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提升脱贫村庄防治返贫能力,建立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促使村庄公共资源更加公平的惠及全体村民,缓解两极分化。(2)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资源约束产生的致贫效应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村庄资源整合和开发新资源的途径,改善脱贫村庄的资源结构和资源利用方式,进而提升脱贫村庄治贫能力。相关结论有助于为深入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升脱贫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能力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公共治理;相对贫困;资源约束;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

DOI:10.48014/csdr.20230405002

引用格式:张舒甜. 资源约束下农村集体经济治贫效应及经验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的贵州 A 村案例分析[J]. 中国可持续发展评论,2023,2(1):1-14.

0 引言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到2030年要消除全世界一切形式的贫困,它包括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社会保障制度与措施要较大程度的覆盖穷人与弱势群体;确保穷人与弱势群体平等的获取经济资源、自然资源、技术、土地、金融服务及其他形式财产的权利;提升弱势群体的抵御灾害能力等多项子目标^①。截至2016年,全球仍有大约7

亿的极端贫困人口,且农村贫困率为17.2%,超出城市地区的两倍多^②。在许多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消除了绝对贫困,至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③。在这样的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着力促进人民共同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张舒甜,2395364497@qq.com

收稿日期:2023-03-05; 录用日期:2023-03-12; 发表日期:2023-03-28

① 资料来源: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_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_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fmprc.gov.cn))。

② 数据来源:贫穷-可持续发展,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poverty/。

③ 数据来源:数据可视化:中国减贫,为世界贡献了什么-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2/26/c_1211040936.htm。

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等多项政策主张^①。中国的减贫重点已从消除绝对贫困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相对贫困治理转变,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1,2]。

土地资源约束、人力资本约束、金融资源约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等资源约束是农村社会致贫的主要原因^[3-7],处理好贫困治理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关键在于提升包括扶贫资源在内的各路资源的配置效率^[8]。“十三五”时期,我国脱贫地区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产业基础等社会经济条件较之前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脱贫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面临土地资源分散、人地矛盾突出、资源利用效率低、人力资源短缺、发展动力不足等一系列挑战。面对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资源约束加剧等现实背景,脱贫地区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

尽管资源约束致使脱贫地区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滞后于较发达地区,但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较多依托农村集体行动破解资源束缚进而顺利摆脱绝对贫困,增强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典型做法。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跨越,全体农村居民的集体行动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地实施的社会基础^[9],集体互助是重要的减贫手段^[10],以集体行动方式实现抱团发展为村民互助合作、共同脱贫创造了基础条件^[1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集体行动的重要载体^[12],在贫困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13],是乡村农地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乡村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4-16]。实现脱贫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社会的“内源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是村庄内源性治理的有效途径^[17]。而目前系统探讨资源约束情境下农村集体经济治贫机制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的治贫效应,运用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构

建资源约束情境之下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利用该框架分析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治贫机制,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揭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如何破解村庄资源约束,进而提升相对贫困治理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为研究降低我国脱贫群体的返贫风险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也有助于为欠发达地区的绝对贫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1 分析框架的构建:资源约束下脱贫村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1.1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ES 框架)

以 Ostrom 为首的学者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村落的公共池塘资源时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ES 框架)的理论基础^[18]。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存在基于自主治理理论和自发性的第三个中心,如社会组织等,且第三个中心的发展与治理水平、治理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9,20]。通过第三部门的自治机制提供公共服务更具相对优势,能够推动社会公平与效率的高度契合,进而有效解决公共服务需求,让乡村内部的自主性力量在公共事务领域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农村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贫困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1]。

SES 治理框架是在多中心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治理情景及治理过程中关键变量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框架^[22]。该理论认为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框架由资源系统(RS)、资源单位(RU)、治理系统(GS)、行动者(A)四个内部子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两个反应总体社会环境的子系统构成^[23]。各子系统又可以包含多个层级变量,研究者可根据具体研究问题,选择不同的二级变量,并进一步开发多层次变量,不同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结果共同作用于一个特定的行动情境,进而产生一个集体行动结果,SES 框架二级变量分布如表 1^[24,25]所示。

① 资料来源: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表 1 SES 框架二级变量分布
Table 1 Secondary variable distribution of SES framework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设定(S)		
资源系统(RS)		治理系统(GS)
RS1:部门(比如水、森林、牧场、渔场)		GS1:政府机构 GS1:政府机构
RS2:系统边界是否清晰		GS2:非政府组织(或第三方组织)
RS3:资源系统规模		GS3:网络结构
RS4:人造设施		GS4:产权系统
RS5:系统生产力		GS5:操作规则
RS6:系统平衡性		GS6:集体选择规则
RS7:系统动态可预测性		GS7:宪制规则
RS8:系统可储存性		GS8:监督和制裁规则
RS9:位置		
资源单位(RU)		行动者(U)
RU1:资源单位可移动性		U1:相关行动者数量
RU2:增减或更替率		U2:行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
RU3:资源单位交互性		U3:资源利用历史和经验
RU4:经济价值		U4:行动者和资源的地理位置关系
RU5:单位数量		U5:行动者的领导力/企业家精神
RU6:可区分特征		U6: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社会资本
RU7:时空分布特征		U7:对所聚焦的 SES 的认知/思维方式
		U8:资源的重要性(依赖性)
行动情境(互动 I——结果 O)		
I1:资源收获水平	I2:信息分享情况	O1:社会绩效测量(如效率、公平、社会可持续性)
I3:协商过程	I4:冲突情况	O2:生态绩效测量(如过度利用、生态可持续性)
I5:投资活动	I6:劝说活动	O3:对其他 SES 的影响/外部性
I7:自组织活动	I8:网络活动	
I9:监督活动	I10:评估活动	
相关的生态系统(ECO)		

1.2 资源约束情境下脱贫村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构建

贫困治理是重要的公共事务治理问题^[26-28],“后精准扶贫”阶段需要构建基于公共服务的减贫基本框架,将公共事务减贫融入共同富裕的实践,实现贫困治理理念的转换^[29]。基于 SES 框架构建资源约束情境下脱贫村庄贫困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是鉴于贫困治理问题的属性考察,无论是脱贫地区过去面临的绝对贫困治理还是当前面临的相对贫困治理问题都是基于脱贫村庄自然资源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特殊性,其中包含了大量的

具有非排他性与竞用性特征的村庄公共资源与村庄公共事物的治理,如脱贫村庄的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治理等,贫困治理问题与灌溉系统、渔业资源、非遗资源等 SES 框架常规研究对象的自主治理问题并无二致,贫困治理的是基层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重要议题。

乡村社会的共建资源包括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两类^[30-32],其中村庄外部资源主要包括政策、资金、地理区位等处于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外部的各因素^[33],即 SES 框架外层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与相关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包括脱贫村庄社会生态系统内部集体资源资产、村民手中资源、村庄治理资源

及不同资源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等^[34,35]。在村庄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划分的基础上,将 SES 分析框架依据脱贫村庄资源要素的实际情况分解到第三层,以增强 SES 分析框架对脱贫村庄贫困治理问题的解释与适用性。村庄内为资源共同构成了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故将资源约束情境下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分为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本文着重分析资源约束情境下的减贫机制,由于一定区域内的相关生态系统变量存在较大相似之处,故相关生态环境的变化非研究重点,借鉴王亚华等学者在借助 SES 分析框架研究文化遗产相关问题时的做法,将相关生态系统中的资源要素作为脱贫村庄贫困治理的内部环境条件予以考察,假设 SES 分析框架的相关生态系统变量在脱贫村庄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不存在差异,暂不予以考察^[36]。而不同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中的治贫资源、治贫能力存在较大差异,所以资源约束情境下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主要考察社会、经济、政治背景。鉴于此,构建了本文用于分析资源约束(resource constraints)情境下的贫困治理问题的资源约束情境下脱贫村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即 RC-SES 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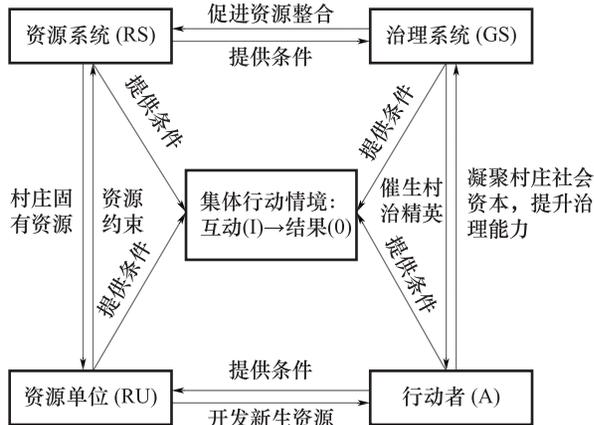


图 1 基于 SES 分析框架:资源约束情境下
脱贫村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Fig. 1 The framework of S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under resource constraints

2 农村集体经济治贫机理分析

在 RC-SES 框架的基本情境中,本文侧重于研究农村集经济发展对脱贫村庄的治贫效应,进而探讨脱贫地区在资源约束情境下,治理系统(GS)的变

化如何通过改变行动者(A)、资源单位(RU)与资源系统(RS)所面临的行动情境,进而影响治理绩效(O)的问题,即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可能通过对脱贫地区村庄社会生态系统的相关变量产生影响,进而缓解资源约束产生的致贫效应。基于前文所构建的 RC-SES 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降低脱贫村庄的返贫风险与相对贫困治理问题具有正向影响。基于 RC-SES 框架相关变量设定如表 2 所示。具体而言,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能够通过两种途径对脱贫群体产生治贫效应。

表 2 基于资源约束情境的乡村社会
生态系统(RC-SES)变量设定

Table 2 RC-SES specification of variables for poverty villages

子系统	变量
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设定	S1-a 社会经济发展
	S2-a 乡村发展政策
资源系统(RS)	RS3-a 村庄资源系统规模
	RS5-a 村庄资源约束
	RS5-b 资源利用方式
资源单位(RU)	RU2-a 新资源
	RU7-a 资源空间与时间分布
治理系统(GS)	GS2-a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GS3-a 村庄资源整合
	GS4-a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行动者(A)	A2-a 致富能手
	A5-a 村庄公共领导力
	A6-a 村庄社会资本
	A7-a 村民的社会生态系统认知
	A8-a 村民的资源性财产收益
行动情境:互动(I)→结果(O)	I1-资源收获水平、I2-信息分享情、I3-协商过程、I5-投资活动、I6-游说活动、I7-自组织活动、I8-网络活动、I9-监督活动
	O1-a 脱贫村庄治贫成效显著/不显著
	O1-b 脱贫村庄相对贫困治理能力强/弱

2.1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GS2-a)促进村庄内部资源整合(GS3-a)提升脱贫村庄治贫效率(O1-a)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村资源整合方面具有独特优势^[37]。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促进乡村资

源整合、盘活,提升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竞争能力,最终促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38]。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将脱贫村庄的农户、村干部、乡贤能人等多元主体纳入到同一场域中,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健全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制度等多维制度治理机制,盘活村民手中的资源,实现村庄内部资源的拼凑。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助于促进经济资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方资源的整合,进而形成村庄的资源合力^[39],突破“小、散、乱”资源结构性约束对脱贫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在推动村庄资源整合,突破资源约束过程中,有助于奠定乡村规模化的经营基础^[25],提升乡村可持续性发展的内生动力^[40]。在资源约束的情境下,村庄资源整合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发展能够从三个方面对脱贫村庄的治贫效率产生影响。

一是资源整合有助于催生一批新的村庄致富能手(A2-a)。一方面,资源整合有助于提升村治基础^[41],夯实乡村生产要素的自有流动与平等交换,能够发挥村治精英的经济社会治理才能^[42]。另一方面,土地是乡村社会的核心资源,土地资源整合会在村庄社会系统中形成新的处于中间社会阶层的农民,且这些中间阶层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村庄公共事务最积极的参与者^[43]。与此同时,资源整合有助于促进外出劳动力返乡创业^[44]。村干部、中间阶层的农民、返乡创业人才是村庄社会系统中重要的致富能手,这些留村发展的致富能手是乡村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重要人力资本,是当前至未来乡村治理的可靠力量^[45]。因此资源整合形成的致富能手是对脱贫村庄劳动力资源匮乏的有力补充,有助于发挥“头雁作用”,进而提升脱贫村庄的内生治贫动力。

二是村庄致富能手能够自发的成为村治精英组成村庄公共领导力(A5-a)。对于乡村社会生态系统而言,村治精英的结构状态直接关系到村庄公共领导力的供给水平^[46]。资源集聚促进人才返乡创业,进而挖掘适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精英人才,有助于切实为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人力保障^[47]。精英人才的培育有助于形成脱贫地区内

生治贫动力的要素基础^[48],进而提升村庄资源配置效率^[49]。因此,村治精英有助于提升脱贫村庄的治理资源,进而提升有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资源约束的致贫效应。

三是通过资源整合形成的资源合力与催生的村治精英能够自发吸引社会资本(RU2-a)。相对村级组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更能够扩大资源的统筹范围,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注入社会资本,降低资金不足、经营管理经验不足、产业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对脱贫村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而提升村庄特色产业开发能力^[50]。财政相对匮乏的中西部乡镇通过利用具有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乡村精英担任村干部,充分利用其“争资跑项”与项目工程垫资能力,有助于提升脱贫地区项目资源的获取能力^[51]。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能力,增强脱贫村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降低脱贫群体返贫风险。

2.2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GS2-a)开发新的资源活力(RU2-a)提升脱贫村庄相对贫困治理能力(O1-b)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为乡村社会经济系统注入新的资源活力。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聚乡村改革、美丽乡村建设、产权制度改革、乡村振兴等下乡公共资源的重要承接载体,为弥补村庄资源短板,增强村庄治理能力提供了便利。农村集体经济产业数字化,充分利用数字资源,有助于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能力,进而提升乡村人才吸附能力,减缓劳动力资源外流。部分村庄资源基础较薄弱的村庄,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借助“飞地”发展模式,以异地置业、异地投资、异地合作等多种形式,提升了其对异地资源的利用能力,提升下乡资源利用效率,进而拓展“输血”+“造血”的相对贫困治理模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阶段,有助于构建乡村社会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治理机制^[52]。

一方面,新资源的注入有助于优化村庄资源结构(RS6-a)。以“绿水青山”为主的生态资源与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是脱贫群体治贫的重要依托,但这类资源的开发通常面临投入较高、周期较长且技术难度较大等难题^[53]。随着公共资源下乡、数字经济赋

能、“飞地”资源利用等新的资源活力注入脱贫村庄,能够改变脱贫村庄内部社会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开发利用其生态、文化资源的困境,优化资源结构,进而提升农村脱贫效率。

另一方面,资源结构优化有助于增加居民的资源性财产收益(A8-a)。在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下,随着村庄资源基础的巩固,提升了脱贫群体资源开发能力,有助于促进村民平等的获得土地、闲置宅基地等村集体所有资产的财产性收益,缓解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54]。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盘活乡村自然资源的制度支撑,正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成了脱贫群体平等地享有村庄集体资产分配权,进而降低村民对村庄资源利用的异质性,减缓相对贫困。

基于 RC-SES 框架及农村集体经济治贫机理分析,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H1: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脱贫群体增收,降低村民间的经济异质性,促使村庄公共资源更加公平的惠及全体村民,减缓两极分化,提升相对贫困治理能力,降低脱贫群体返贫风险。

假设 H2: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资源约束的致贫效应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方法选择

为检验资源约束情境下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治贫效应,本文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有助于通过对实践情境进行细致的描述分析,更加清晰地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怎么样”的问题,典型案例研究通常具备在理论和实践认知基础上的“黑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适合做单案例的研究^[55,56]。本文研究的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如何突破资源约束推动建立脱贫村庄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并验证农村集体经济治贫效果的问题,属于“如何”与“怎么样”问题的范畴。因此,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分析“互动-结果”的行动情境问题,本文着重以贵州脱贫地区的 A 村为典型案例,探索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突破村庄资源约束,推动建立脱贫村庄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行动情境。

3.2 案例选择

A 村距县城 65 千米,距最近的高速路口 25 千米,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 65.6%,森林覆盖率 71%。本文之所以选取 A 村作为研究案例,理由有三:其一,A 村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之前,是典型的资源匮乏型贫困村。1978—2001 年,A 村贫困人口由 420 人上升至 600 人,贫困人口不降反增,村党组织基础薄弱,后备干部不足,村级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人力资本积累较弱,村集体经济一穷二白,缺乏规模性产业支撑,“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涣散,林场、生态资源等村集体所有的资源未能充分发挥其经济价值。其二,A 村是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逐步破解资源束缚,成功摆脱绝对贫困,促使发展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的典型代表。自 2001 年开始,该村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业布局、利益联结为发力点,以“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逐步提升村庄资本积累,以“三变”改革为手段盘活村庄各类资源,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帮助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形成了全体村民增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其三,A 村是内生发展的典型案例。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之前,A 村是资源匮乏、贫困落后村庄的典型代表,但该村二十多年以来,坚持走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逐步形成了村庄“三资”优化、人才培育、产业培育、风险防范的自主发展能力培育体系,实现了村民多渠道增收、拓宽了村民“务农、顾家、挣钱”三不误的途径,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缓解城乡差距,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借鉴。

3.3 资料来源

本文的资料收集主要以半开放式问题访谈为主,辅以村庄基本情况调研问卷、内部资料、公开报道等多种形式的资料。2021 年 8 月,课题团队赴 A 村进行了集中调研,采用半开放式的问题访谈了包括乡镇干部、村支两委干部、村集体经济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返乡青年在内的乡村社会经济参与的主体。半结构化访谈内容包括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主要影响因素、经验做法、存在的困难

及其化解、村集体经济发展对村庄社会经济发展及村民的影响等内容。Ostrom^[57]强调,基于 SES 框架分析研究问题时,并不需要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中所有的变量,而是需要有侧重的对部分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半开放式访谈所获得的一手资料能够为本文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奠定基础。

3.4 RC-SES 框架变量分析

表 3 分别选取了 A 村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之前(2001 年)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之后(2020 年)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及相关子变量。

(1)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之前(2001 年)

2001 年以前处于探索性的贫困治理阶段。为改变贫困落后的村貌, A 村村民自发的向贫困发起挑战,村民自发组建了“山鹰”突击队,带动村民修马车路、建设生态林、修房子。但由于当时 A 村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社会经济资源极其落后,这些尝试只是稍微改变了生存生活条件,村无积累、户无闲钱的贫困状态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贫穷人口(O1-a)规模不断扩大。

2001 年以前 A 村贫困治理成效甚微,村民的勤劳、奋进、团结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深度贫困状态。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村民对村庄资源认识不足(A7-a)。缺乏经济发展能力强且具备企业家精神的致富能手的村治精英(A2-a),这一阶段的贫困治理,主要依靠人背马驮,重视村庄道路、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充分认识到村庄特色民族工艺、林地等固有资源的价值(RS3-a)。二是贫困治理受制于社会经济资源不足(RS5-a)。2001 年以前村庄劳动力资源、市场资源、村集体经济“三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经济资源基础较差。在对村庄已有资源利用不充分,社会经济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贫困治理很难获得资金支持,依托现有的资源利用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深度贫困的窘境。

(2)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治贫实践

2001 年起,新认村支书接任 A 村新支书,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平台,带领村民修路通水,首先解

决村民基本生存难题;将自有资产与村集体林场资产作为抵押,获得村企发展的启动资金。2001—2014 年期间,依托村庄公共林地资源抵押等形式,获取村庄企业启动资金,以“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逐步扩大村集体积累,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2014 年开始发展股份制改革,充分调动村庄内外资源,动员优秀青年到村任职,带领村民共同致富,首先是迎着“三变”的春风,以党建为引领,引导全体村民以筹集资金、土地经营权折价入股村集体企业;其次对接资本市场,引进工商资本 1.5 亿元;最后带动周边村庄共同发展,实现村庄资源优势互补。

基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GS2-a),村庄资源的利用不局限于土地资源,通过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GS4-a),整合村庄资源(GS3-a),有效缓解了资源束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开辟了适合村庄社会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方式(RS5-b)。盘活村庄内部特色民族特色酿酒工艺、林地资源、土地资源、村民手中的资源等,能够形成资源的规模化经营,使村庄资源效益最大化(RS3-a)。充分利用的当地资源有助于提升村民财产性收益,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有助于激活村庄自主发展活力,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3)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之后(2020 年)

A 村 2001 年底开启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之路,优化了村庄社会生态系统的资源基础与资源配置方式,强化了贫困治理制度基础与贫困治理的角色。到 2020 年, A 村的资源基础与资源配置方式显著优化, A 村的贫困治理已经进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相对贫困治理阶段。

基于村集体经济组织平台整合村庄资源(GS3-a),集中利用资源更加符合村庄自然生态资源分散,社会经济资源严重不足的当地实际状况。以“股权联营”的方式(GS4-a)将村民纳入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建立村民与村庄发展的利益共同体,能够进步激活村庄社会资本(A6-a),提升村民参与积极性,形成有限资源的规模化经营。吸引社会工商资本,壮大村级产业资金实力。

表3 两个时间节点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SES)及其子系统的变量

Table 3 Key variables of two time nodes of rural SES and its subsystem

子系统	变量	时间点:2001年	时间点:2020年	系统构成板块状态
资源系统(RS)	RS3-a 村庄资源系统规模	自然资源丰富,但呈现“小、散、乱”的特征;路不通村,电不通户	村庄资源呈现规模化特征,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	2001年开始通过发展壮大的农村集体经济,形成了资源、资产、资金实力雄厚的村庄
	RS5-a 村庄资源约束	劳动力资源、市场资源、村集体经济“三资”、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经济资源紧张	劳动力资源较丰富;通过建立“引才、引智、育才”人才培育机制,提升了人力资本积累;核心产品经销商遍布全国;村庄整体的资金、资产实力雄厚	
	RS5-b 资源利用方式	分散经营	规模化经营	
资源单位(RU)	RU2-a 村庄新生资源	较少的政府扶持资源	通过村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龙头企业注入大量资本;政府注入资金、政策支持;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创业精神、党性教育基地等新生文化资源	2001年开始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村企发展注入了新的资源活力,降低了资源约束的致贫效应
	RU7-a 资源空间与时间分布	资金基础薄弱,村庄经济发展仅依赖“在地”资源	充分整合周边村庄土地资源,突破土地资源对产业发展的束缚	
治理系统(GS)	GS2-a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一穷二白”	村集体积累890万元,村集体资产达1.12亿元	2001年开始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形成的资源整合,拓展了产业治贫、资源治贫、制度治贫等多重治贫路径的协同治贫运作模式
	GS3-a 村庄资源整合	村庄资源呈现“小、散、乱”的结构性特征;优质资源性资产闲置;特色民族文化资源价值不明显	呈现“小、散、乱”的土地资源、林地资源、生态资源、特色民族文化等村庄资源得以整合,成为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依托	
	GS4-a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不充分	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三变”改革为手段,充分整合村民手中的资源	
行动者(A)	A2-a 致富能手	缺乏经济发展能力强且具备企业家精神的致富能手	培育了一批适宜村庄经济发展的致富能手	2001年开始以“村社合一”模式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挖掘村庄精英带头人,逐步完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了村庄公共领导力,进而巩固了村庄社会资本
	A5-a 村庄公共领导力	村干部队伍“青黄不接”	动员优秀青年人才到村两委任职,结合“双培双带”人才培育机制将有思路、懂发展的党员培养成村集体经济的管理经营人才,实行村企交叉任职	
	A6-a 村庄社会资本	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土地产权关系为纽带,两者的关系较松散	“股权联营”,以股权为纽带,将村民凝聚成“联产联营、联营联心”的利益共同体	
	A7-a 村民的社会生态系统认知	没有充分利用村庄民族文化资源	充分利用彝族特色酿酒工艺,将“人民的小酒”打造成为村庄核心产品	
	A8-a 村民的资源性财产收益	土地分包到户,产量有所提升,但财产性收益较低;林产资源未产生显著收益	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价值提升,林产资源成为村企发展的“绿色银行”,村民获得财产性收益	

续表

子系统	变量	时间点:2001 年	时间点:2020 年	系统构成板块状态
互动(I)		I1-资源收获水平、I2-信息共享情、I3-协商过程、I5-投资活动、I6-游说活动、I7-自组织活动、I8-网络活动、I9-监督活动		
结果(O)	O1-a 脱贫村庄治贫成效显著/不显著	年均收入不足 800 元,1/3 的人口在温饱线以下	村民人均纯收入 3 万元,全体村民摆脱绝对贫困	随着村集体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村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激励了以发展村集体经济为主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O1-b 脱贫村庄相对贫困治理能力强/弱	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	为村民提供创业、务工、务农、财产性收益等多途径增收渠道	

4 经验性检验结果分析

截至 2020 年,A 村已经形成了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被列入了省级村集体经济建设示范村。在资源约束的情境下,探索了通过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村庄资源,引进外部资

源,提升村民增收致富能力的发展之路。为进一步验证农村集体经济在资源约束情境下的治贫效果,本文使用 RC-SES 框架动态化地显示了 A 村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各变量产生的影响和产生的治贫效应,以检验上述两个研究假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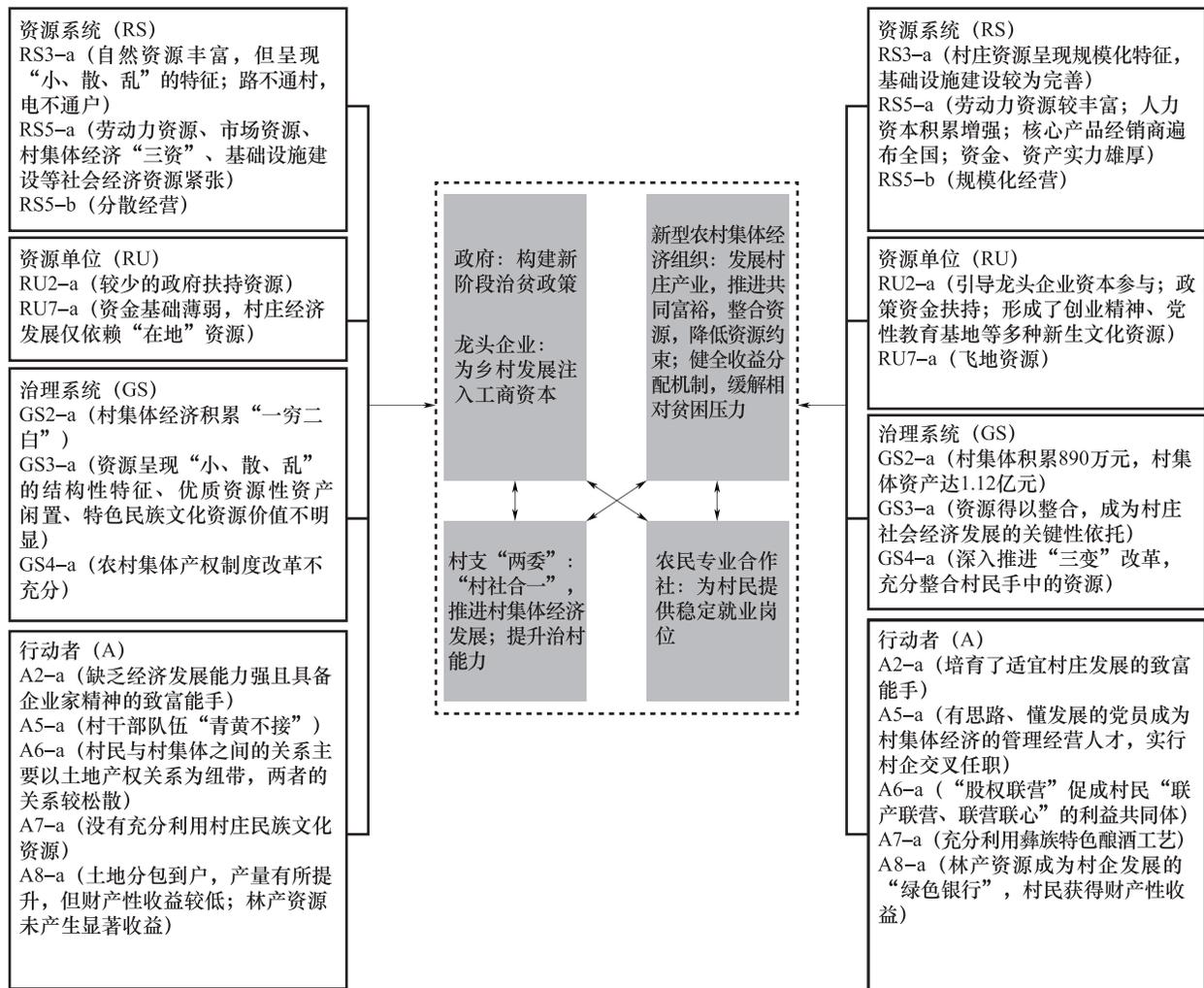


图 2 基于 RC-SES 分析框架:脱贫村庄 A 村贫困治理

Fig. 2 Poverty alleviation in village A based on RC-SES framework

4.1 资源系统效果检验

在开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之后,村庄交通、用电等基础设施逐步改善,2002年新任村支书通过上级政府借款、利用村庄坑木及个人财产作为抵押赎回林场,赚得A村集体第一桶金,实现村庄积累从无到有。随后利用林场资源抵押获取贷款资金,创办多家村办企业,为村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4年通过深入推进“三变”改革,集聚村民手中的资源,盘活村庄闲置资源,形成了村庄资源的规模化经营,资源价值进一步提升,成功破解了村庄“小、散、乱”的资源结构性约束。截至2020年,A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9800万元,带动周边村庄经营性收入增长超30万元。

4.2 资源单位效果检验

A村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之后,为村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资源活力,借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平台,逐步补齐了村庄社会经济不足的短板。引进当地龙头企业资本投资,夯实产业基础;推动联村党建,以党建为引领,整合周边村庄的土地资源,进一步拓展了资源引进渠道;坚持走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衍生了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党性教育基地等文化资源。这一系列新生资源促使A村成功突破资源约束,形成了A村强大的产业发展基础,村民收入大幅提升,90%以上的劳动力留村发展,且实现了“务农、顾家、挣钱”的美好生活。

4.3 治理系统效果检验

A村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之后,为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搭建了公共治理平台。深入推进“三变”改革,盘活村庄资源不仅有助于提升村庄资源整合能力,推动村庄集体企业发展,同时也能够增加村民的财产性收入,提升村庄资源的发展合力。截至2020年底,A村村民连续四年平均每年获得了900万元的分红。

4.4 行动者效果检验

2001年A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之后,“村社合一”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结合“村社交叉任

职”的模式,催生出一批村治精英。以村支书为主要代表的村治精英借助村集体经济发展平台为A村创造了大量的发展机会,首先是发展之初的通过无偿垫资、个人财产抵押等获得了村庄的发展资金,其次是以其敏锐的经济发展能力,提升村庄资源利用效率,带领村民先后创办多个集体企业,抓住政策发展机遇,在村庄致富能人余留芬的带领下A村社会经济基础获得了“滚雪球”式的积累。在村集体企业的带动下,部分村民开始自发的创办了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村庄致富能手,在这些合作社取得一定收益之后,又免费为其他村民传授技术与经营管理经验,为村庄困难群众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促使全民参与到村庄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借助村集体经济人才培养,为A村培养了“土专家、田秀才、技术骨干”300余名,其中57人获得农业中级职称。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催生的村治精英、致富能人、专业技术人才等多元主体是推动实现A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动力。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脱贫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为研究对象,在构建资源约束情境下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与现实的对照,对贵州A村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形成的治贫效应进行了探索式分析,说明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破解资源约束产生的致贫效应。首先借助村集体经济发展平台有助于促进村庄资源整合,盘活闲置资源,作为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整合有助于发挥资源合力,以破解村庄资源“小、散、乱”特征的约束,提升脱贫地区防贫治贫能力。其次,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脱贫村庄充分利用“飞地”资源、提升下乡资源利用效率、吸引社会企业资源等,进而完善脱贫村庄资源结构,补齐短板资源,实现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长久以来,脱贫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约束的限制,因此旨在构建突破资源约束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十分必要。换言之,脱贫村庄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受制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能力较低,社会经济资源不足等约束,致使村庄现有

资源对于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所发挥的支撑作用不够充分,资源利用方式有待优化。通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破解脱贫地区资源约束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长效作用,文章将基于破解集体行动困境而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与脱贫村庄资源约束的特殊情境相结合,构建了分析脱贫村庄公共治理的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以贵州 A 村为例,尝试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所具有的治贫效应。从理论上构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治贫效应的分析框架,发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对于激活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存在的可能,有助于为推动构建实现脱贫地区共同富裕目标的长效机制提供经验证据。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小鹏,冯康利,卫宇曦,等.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及其学科范式[J].地理学报,2023,78(03):572-586.
- [2] 顾昕.共同富裕的社会治理之道——一个初步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23,38(01):45-67,227.
- [3] 郭咏琳,周延风.从外部帮扶到内生驱动:少数民族 BoP 实现包容性创新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04):159-180.
<https://doi.org/10.19744/j.cnki.11-1235/f.2021.0055>
- [4] 杜威漩.农民工返乡创业减贫效应生成机理及政策启示——政策激励视角的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9(02):76-83.
- [5] 林榕,徐悦馨,王晓艳.民族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成果巩固拓展的原则和策略[J].民族论坛,2020(04):85-91.
- [6] 徐静易.精准扶贫背景下土地整治模式优化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21.
<https://doi.org/10.19683/j.cnki.mzlt.2020.04.014>
- [7] 周丽.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21.
<https://doi.org/10.27136/d.cnki.ghunu.2021.000016>
- [8] 王媛,范建刚.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J].甘肃社会科学,2023(01):208-217.
<https://doi.org/10.15891/j.cnki.cn62-1093/c.20230118.001>
- [9] 张明皓,叶敬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机制构建和政策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21(10):110-118.
<https://doi.org/10.16158/j.cnki.51-1312/f.2021.10.012>
- [10] 陈丽娟,舒展.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J].西亚非洲,2021(06):63-83,158.
- [11] 高杰,郭晓鸣.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的多重挑战与政策选择[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01):131-134.
<https://doi.org/10.19898/j.cnki.42-1704/c.2020.01.023>
- [12] 王亚华,臧良震.小农户的集体行动逻辑[J].农业经济问题,2020(01):59-67.
<https://doi.org/10.13246/j.cnki.iae.2020.01.006>
- [13] 胡凌啸,周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对客观和主观相对贫困的评估[J].农村经济,2021(11):1-9.
- [14] 郭晓鸣,张耀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领域拓展及动能强化[J].经济纵横,2022(04):87-95.
<https://doi.org/10.16528/j.cnki.22-1054/f.202204087>
- [15] 宋敏,韩曼曼.生态福祉视角下的农地城市流转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与框架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11):94-103,112.
<https://doi.org/10.13246/j.cnki.iae.2016.11.011>
- [16] 李文钢,马良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复兴与乡土社会重建——学术回应与研究反思[J].社会学评论,2020,8(06):58-68.
- [17] 王海英,夏英.共同富裕视角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2,43(05):118-125.
<https://doi.org/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22.05.016>
- [18] 谢梦玲,王昌海.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研究进展及展望[J].资源科学,2022,44(08):1707-1722.
- [19]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316423936.002>
- [20] 谭江涛,蔡晶晶,张铭.开放性公共池塘资源的多中心治理变革研究——以中国第一包江案的楠溪江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8,15(03):102-116,158-159.
<https://doi.org/10.16149/j.cnki.23-1523.2018.03.007>
- [21] 李志强.精准扶贫的法理正义与路径选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4):64-71.
<https://doi.org/10.16152/j.cnki.xdxbsk.2017-04-010>
- [22] 黄安,田莉,于江浩,等.治理视角下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估[J].农业工程学报,2021,37(13):232-241.
- [23] 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2009,325(5939):419-422.

-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2133>
- [24] Araral E. Ostrom Hardin and the commons: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and a revisionist view[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2014, 36: 11-23.
<https://doi.org/10.1016/j.envsci.2013.07.011>
- [25] 苏毅清, 秦明, 王亚华.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20, 36(07): 185-198.
<https://doi.org/10.19744/j.cnki.11-1235/f.2020.0110>
- [26] 王莲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贫困治理的四重维度[J]. *领导科学*, 2022(10): 139-142.
<https://doi.org/10.19572/j.cnki.ldkx.2022.10.035>
- [27] 李晓梅, 白浩然.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J]. *行政论坛*, 2019, 26(02): 34-39.
<https://doi.org/10.16637/j.cnki.23-1360/d.2019.02.023>
- [28] 姜晓萍, 李敏. 治理韧性: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维度与效度[J]. *行政论坛*, 2022, 29(03): 5-12.
<https://doi.org/10.16637/j.cnki.23-1360/d.2022.03.001>
- [29]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 性质、成因及其治理路径——基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视角[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8(05): 1-9.
<https://doi.org/10.13718/j.cnki.xdsk.2022.05.001>
- [30] 邓永超, 张开云, 贾莉.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强力衔接的三维进路[J]. *理论探索*, 2023(01): 83-89.
- [31] 余乐, 孙欣, 陈卫平. 小农户联盟何以实现价值共创: 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2): 80-89.
<https://doi.org/10.13300/j.cnki.hnwkxb.2023.02.008>
- [32] 鲁萧萱, 暨爱民. 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干部的交往实践研究[J/OL].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2): 120-128[2023-03-31].
<https://doi.org/10.13438/j.cnki.jdxb.2023.02.012>
- [33] 罗强强, 王燕子. 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中的情感培育——以新疆“访惠聚”驻村工作队实践为例[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06): 12-19.
- [34] 黄丽芬.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缺位与行政再造[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03): 128-138.
<https://doi.org/10.13300/j.cnki.hnwkxb.2022.03.012>
- [35] 桂晓伟.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76(01): 175-184.
<https://doi.org/10.14086/j.cnki.wujss.2023.01.017>
- [36] 侯涛, 王亚华. 县域非遗空间分布的文化生态影响因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61(04): 75-85.
<https://doi.org/10.19992/j.cnki.1000-2456.2022.04.008>
- [37] 郭晓鸣, 张耀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合作社融合发展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J]. *中州学刊*, 2022(05): 27-34.
- [38] 舒展, 曾耀岚.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现实困境与可能路径[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05): 144-152.
<https://doi.org/10.16822/j.cnki.hitskb.2022.05.019>
- [39] 杨铃, 张欢. 内驱与外引: 层级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贵州省石阡县S村“村社合一”的个案分析[J]. *地方治理研究*, 2022(04): 51-63, 79.
- [40] 吕洁琼, 文军.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社区为本的情境实践及其反思——基于甘肃K县的考察[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03): 173-187.
<https://doi.org/10.16486/j.cnki.62-1035/d.20210709.001>
- [41] 钱全. 乡村振兴背景下公共品供给模式类型及其治理分化[J]. *学习与实践*, 2021(07): 85-95.
<https://doi.org/10.19624/j.cnki.cn42-1005/c.2021.07.010>
- [42] 彭凌凤, 匡远配. 关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探讨[J]. *农村经济*, 2023(02): 67-74.
- [43] 贺雪峰. 论中坚农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04): 1-6, 131.
- [44] 黄祖辉, 宋文豪, 叶春辉, 胡伟斌.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01): 24-43.
- [45] 刘芳, 孔祥成. 乡贤治村: 生成逻辑、实践样态及其完善路径[J]. *江海学刊*, 2020(06): 116-123.
- [46] 许晓, 程同顺. 中国共产党引领乡村治理的百年回望与经验启迪[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2, 11(02): 74-86.
- [47] 王世泰, 谈育明.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 关键要义、逻辑分析及现实进路[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03): 21-28.
<https://doi.org/10.13891/j.cnki.mer.2023.03.012>
- [48] 陈子真. 内生性脱贫动力差异化路径培育研究——基于48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04): 69-78.
- [49] 唐莹. 城乡融合背景下耕地利用转型新动力与转型推进策略[J]. *农村经济*, 2022(11): 34-41.
- [50] 何得桂, 赵倩林. 组织学习与集成治理: 制度优势转化为集体经济发展效能的有效路径——以石泉县“三抓三联三保障”为例[J]. *社会主义研究*, 2023(01): 116-124.

- [51] 卢丛丛. 嵌入型政权:治理精细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及逻辑[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2, 24(05): 20-28.
<https://doi.org/10.16326/j.cnki.1008-7168.2022.05.003>
- [52] 张新文, 杜永康.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2): 23-33.
<https://doi.org/10.13300/j.cnki.hnwkxb.2023.02.003>
- [53] 李逸平. 我国生态服务型经济发展的实践进展及突破策略[J]. 西南金融, 2021(07): 27-38.
- [54] 程漱兰, 李爽. 新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形成和演进的历史逻辑以及若干热点问题探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03): 19-31.
- [55]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Design and Methods[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17.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9970.003.0048>
- [56] 周立, 奚云霄, 马荟, 等. 资源匮乏型村庄如何发展新型集体经济? ——基于公共治理说的陕西袁家村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 433(01): 91-111.
- [57] 王光菊, 陈毅, 陈国兴, 等. 森林生态-经济系统协同治理分析:机理与案例验证——基于福建省 5 个案例村的调研数据[J]. 林业经济, 2020, 42(10): 39-49.
<https://doi.org/10.13843/j.cnki.lyjj.20210122.001>

Research on the Effect and Experienc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Resource Constraints: Case Study of Village A in Guizhou Province Based on SES Framework

ZHANG Shutian

(College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How to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stablish a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relative poverty is a major project of steady moves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ES), this article builds a rural social ecosystem framework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area under the context of resource constraints, uses this framework to develop a dynamic exploration and diagnosis on the poverty governance process before and after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s developed and expanded,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governing povert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n rural areas. Research finding shows that: (1)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can help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poverty prevention,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to promote the material benefits of the villagers with more fair public resources, remitting the polarization. (2)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ve a positive role in regulating the poverty effected by resource constrain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village resources and develop new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resource structure and resource us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villages, improving the abilit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lated conclusions will be helpful in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revelation to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enhancing the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public governance; relative poverty; resource constraints;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ES)

DOI: 10.48014/csdr.20230405002

Citation: ZHANG Shutian. Research on the effect and experienc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n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resource constraints; case study of village A in Guizhou Province based on SES framework [J]. Chine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view, 2023, 2(1): 1-14.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Science Footprint Press Co.,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open accessed under the CC-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